

体育博彩消费中问题博彩行为的心理机制研究

王树明, 白彩梅, 季 浏

摘要: 透过心理学的理论来解释彩民的问题博彩行为, 对问题博彩行为的心理学成因进行分析探讨。研究认为, 在体育博彩中外界相关刺激强化了彩民的博彩行为; 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决定彩民的博彩行为; 内隐学习是解释彩民对随机事件持有不合理想法的重要机制; 彩民在博彩中的非理性思维是问题博彩行为形成的基础, 它会削弱彩民的控制能力, 将彩票消费推向问题博彩。

关键词: 体育彩票; 问题博彩; 消费行为; 心理机制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1207(2012)03-0018-05

Psychological Study of the Problem Gambling Behavior in Sports Gambling Consumption

WANG Shu-ming, BAI Cai-mei, JI Liu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Adopting the theory of psychology, the paper tries to explain the problem gambling behavior of the punters and discusses the psychological cause for the problem gambling behavior. The result shows that in sports gambling, the correlative stimulation from the outside intensifies punters' gambling behavior. Both the personal factors and environment factors decide punters' gambling behavior. Implicit learning is an important mechanism for the reason why some punters have unreasonable ideas toward random events. Punters' irrational thinking is the cause for their problem gambling behavior. It decreases the control ability of the punters and causes problem gambling in lottery consumption.

Key words: sports lottery; problem gambling; consumption behavior;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博彩业大体可分为彩票、赛马、赌场等3个不同的层面。目前经中国政府批准的博彩活动仅限彩票层面; 赛马不允许有博彩行为, 赛马活动仅控制在体育竞技层面; 而赌场从未开禁过。作为博彩业主要组成部分的体育博彩业以发行体育、赛马、赛车、足球、自行车彩票等为主要渠道, 主体行业是体育彩票业^[1]。

体育博彩业在我国还是一个新兴产业, 只有十几年的发展历程, 近年无论是在销售规模还是在发展速度方面都有着显著的变化, 是体育事业和公益事业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经济支柱之一。但是, 中国体育彩票业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一些问题, 并制约着行业的发展, 其中影响较大的是问题博彩。相对于正常博彩者而言的, 问题博彩者是指在博彩过程当中, 抱着“中大奖”、“一夜暴富”的心态, 相信自己的运气, 认为通过自己的“特殊技能”能够赢取奖金, 对随机事件的误解、盲目下注, 进而对其行为达到无法控制的一个彩票消费群体^[2]。问题彩民往往呈现出一种对彩票在精神上“成瘾”的症状, 进而演变成一种生理问题。

目前, 中国体育彩票消费中, 问题博彩行为日渐凸显。据《上海市体育彩票问题博彩行为调研报告》显示, 近1200名被试者中问题彩民约占12%, 病态彩民占1.4%。这一数据与港澳等地的学术机构统计的比例相近。北京大学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所长王薛红指出, 国外统计的问题彩(赌)民比例是2%~3%, 中国有2亿彩民, 再加上地下私

彩, 即便是按照最低的比例计算, 也有400万。遗憾的是, 无论是问题彩民本人, 还是彩票发行销售机构, 都还没有对此问题给予足够重视。而且问题博彩的现象也尚未引起彩票发行管理层的足够关注。已于2009年7月1日正式实施的《彩票管理条例》中并没有将问题彩民纳入规范之列。

由此可见, 我国体育博彩者中的问题博彩行为状况已相当不容乐观, 但是, 此现象还未引起个人和相关机构的重视。彩票消费中的问题博彩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 这不仅关系到我国体彩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也将对和谐社会的构建产生重大影响。

所以, 本文试图在心理学、行为经济学以及消费者行为学等学科的理论基础之上, 对体育博彩中问题博彩行为的心理机制及其的心理学成因问题做一探讨, 以期使国内研究者对问题博彩的成因和影响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为促进我国的体育彩票业的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1 问题博彩行为的心理学理论基础

问题博彩行为涉及心理学以及行为经济学等诸多理论, 本文以心理学为基础, 主要对学习理论, 包括经典条件作用、操作条件、社会学习理论以及内隐性学习等心理学理论进行阐述, 并基于这些理论对问题博彩行为进行分析与探讨。

1.1 条件反射理论

本文主要从经典条件反射和操作性条件反射两个理论入

收稿日期: 2012-04-20

基金项目: 201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0ZD&052)子课题

第一作者简介: 王树明, 男, 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 运动心理学。

通讯作者: 季浏, 男, 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 体育课程改革。

作者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上海 200241



手,对问题博彩行为进行解释探讨。

经典条件反射是以19世纪后期由巴甫洛夫(Ivan Pavlov)狗的实验而著名的一种学习。现在已经被应用到心理学的许多领域。巴甫洛夫通过实验得出“狗学会了将铃和呈现食物联系起来”的结论。在该实验中,食物就是非条件性刺激(US),铃声即是条件性刺激(CS)。

这种条件反射的学习可以对问题博彩行为作一些解释。在博彩环境中“赢了,中奖了”就是非条件性刺激(US),彩民产生兴奋唤醒(arousal),即对赢的一些自然反应。一些研究发现,博彩会导致心率加快(Anderson等,1984)^[3]、主观兴奋状态、“解离”(dissociation)(即个体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心智与行为分离的现象)(Jacobs,1986)^[4]。在不断获胜和兴奋高涨的博彩环境下,与博彩环境相关的刺激也会导致此种唤醒状态的产生。例如,彩民会对自己经常购买的中奖较多的彩票号码、所投注的某支经常赢的球队和所竞猜的某个经常获胜的马匹号等产生兴奋感。这种兴奋感可能会促使其继续选择以前的彩票号码,继续投注一直支持的球队和盲目地压注自己一贯坚持的马匹号,想再“搏一搏他/她的运气”,甚至不顾球队的背景以及马匹的实际情况。

另外一种条件反射学习理论是操作性条件反射。操作性条件反射(operant conditioning)是由Skinner(1954)提出。该理论分两种形式:正强化与负强化。正强化是指在具体行为之后,刺激结果增加从而增强具体行为的强化。如在试验中,当老鼠按一下杠杆就给它食物,即为正强化;负强化是在具体行为之后移除一个厌恶的刺激,来增强行为的强化。如一只老鼠可能会在笼子里遭受电击直到它按下杠杆。动物学会按杠杆或跑到笼子的另一边以逃避厌恶刺激(如电击)。反映在博彩中,不少彩民发现博彩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缓解压力、焦虑、消沉及其他消极行为的良好途径。通过博彩他们的消极情绪可以得到缓解,这能导致赌博行为的负强化的发生(Marlatt等,1985)^[5]。有些彩民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的不如意,如工作、家庭以及日常事物等带来很多的压力,使其梦想“中大奖”来“逃避”这种生活,所以他们不停的博彩,在“中大奖”的期望中一步一步走向问题博彩。

正负强化可以解释彩民持续的博彩行为。研究表明(Turner等人,2006)^[6],负强化有可能比正强化重要得多。这可能是由于博彩的正强化是间歇性的(中奖的几率毕竟少),彩民不时的中奖,经常能体验到“中奖的喜悦”;相反,负强化几乎在每一次的博彩中都会发生。研究显示,无论什么样的赌注结果,只要彩民还有钱去玩,他们仍然梦想着中大奖,因为个体不确切地知道下一次中奖会在什么时候到来,但是他们知道,如果他/她想继续中奖的话就得继续博彩。

彩民为什么会发展成为问题彩民呢?可能是彩民在博彩中的“形塑(shaping)”过程造成的。所谓“形塑(shaping)”即最大成功地接近与所需要的行为的强化(奖励)(Skinner,1953)^[7]。回到Skinner的实验中来,放置在斯金纳箱的老鼠在变化比率的强化下并没有一下就作出反应,而是在它靠近杠杆时第一次给老鼠奖励,接下来是等老鼠按下杠杆后才给予奖励。老鼠这种不断摸索的过程就是“形塑”的过程。Reid(1986)在其提出的“差点赢”中对此也有所解释^[8]:快接近中奖就是“形塑”的过程,该过

程引诱彩民步入“问题博彩或病态博彩”的陷阱之中。

此外,Turner等(2006)研究发现,早期赢钱的经历和第一次赢钱的数量都和问题赌博的严重性有很大的相关性。通过采访问题彩民,他们说,早期博彩经验经常会记得非常牢(fondly),也许,问题博彩者是由于在博彩早期中随机发生的形塑经验建立起来的,后来通过间歇性强化而得以保持。如果这种解释是正确的,那么,大多数彩民没有变为问题彩民可能是由于大部分人还没有那种可以导致问题彩民的行为的形塑方式。

1.2 社会学习理论

Bandura(1986)提出三元交互决定理论,即强调在社会学习过程中行为、认知和环境三者的交互作用。Ariyabuddhipongs(2007)^[9]指出彩民博彩动机有两类: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个人因素主要是对中奖的过分期望和非理性思想,如迷信,认知偏差;环境因素主要有家庭成员、朋友、媒体的影响力。Coups等(1998)^[10]研究发现,个体购买彩票的频率与其朋友购买彩票的频率呈正相关。Griffiths(2000)^[11]指出,孩子的购买彩票行为与家长购彩行为有显著的关系。另外,媒体对奖金的宣传,如在一些彩票点随处可见极具诱惑力的宣传:“投入两元钱,拿走五百万”、“某某下岗工人两元中得五百万”、“某某坚持买彩票终于中大奖”等等。周围朋友以及媒体的宣传等向彩民灌输了大量的不劳而获、一夜暴富的思想,刺激了彩民的中奖期望。而彩民的中大奖意识又与购买彩票的频率和数量有关(Ariyabuddhipongs,2007)。所以,彩票购买频率、数量和对特殊号码的追逐等博彩行为是由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决定的。

此外,在博彩环境下,社会促进(social facilitation)可以对博彩行为的持续性作一解释。社会促进,也称社会助长,指个体完成某种活动时,由于他人在场或与他人一起活动而造成行为效率提高的现象。反映在博彩中,其他个体对个体的博彩行为产生一定影响。已有研究表明,与个体独自博彩相比,个体在群体博彩中显示出更冒险的倾向。(Blascovich等,1975)^[12]Holtgraves(1988)探讨了个体下注的钱是如何被赋予特定的含义的^[13]。在彩民看来,一个人下大量赌注或购买很多注彩票会引起别人的另眼相看。因此,在集体博彩过程中,个体更倾向于冒险,以此来展示他们的“个性”,并且,提高他们的自我形象。一些有趣的研究已经探讨了社会促进(social facilitation)和博彩成功的关系,研究发现,在预测获胜(中奖)概率时,在赛马场这些公共场所比任何个人或专家更为准确。另外,公共场所往往低估高概率事件而高估低概率事件(Metzger,1985)^[14]。因此看来,处在集体中的彩民在估计概率时往往不同于个体对概率事件的估计。

1.3 内隐学习理论

Reber(1993)指出,内隐学习就是无意识获得刺激环境中的复杂知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个体并没有意识到或者陈述出控制他们行为的规则是什么,但却学会了这种规则。

内隐学习在情境多变、紧张应激、事物结构高度复杂、关键信息不明确、个体生理条件差(例如精神失常,大脑病变,神经受损)的学习情境中,优于外显学习^[15]。而体育博



彩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随机性,这样,内隐性学习或许对问题博彩行为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解释意义。

大多数研究(Gaboury等1989;Walker,1992;Toneatto,1999)^[16-18]认为,彩民对随机事件持有不合理的想法(erroneous beliefs),而内隐学习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彩民错误信念的一种机制(mechanism)。由于人们每天暴露在不是积极参与就是思维意识加工后剩余的大量的刺激中,且不断地从环境中的刺激(如颜色、速度、数量和频率)提取一定的信息,这些刺激促使个体努力地感知(make sense)周围世界的规则,从日常经验中寻取规律性和期望,即“我们的思想,旨在寻找秩序,不欣赏混乱”,结果,个体容易对随机事件形成错误的信念(Turner,2000)^[19]。

问题彩民可能在博彩中遇到一些事情(不寻常的赢的经历),如一次偶然的的机会,某人选了一个奇偶数相间的号码中奖了,这会使其产生一些“心里规则”,即彩票中奖号码是有规律可循的,认为随机事件是可预测的,相信自己能够对博彩结果产生影响。长此以往,这些规则诱使彩民沉迷于博彩,进而发展为问题彩民。

以上是在心理学的一些理论的基础上,对问题博彩行为作了探讨。此外,行为金融学理论,诸如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心理账户(Mental Accounting)及沉没成本效应(Sunk Cost Effect)等理论都可作为问题博彩行为的理论基础,限于篇幅,在此不做论述。

2 问题博彩行为的心理学成因

在体育彩票消费中,一些彩民由于缺乏正确博彩行为的引导、对彩票的有限理性认识,往往会偏离购买彩票的公益性和游戏性特征,在消费中出现了一系列的认知偏差,从而引发出诸多非理性消费行为和心里变化,如控制幻觉、归因偏差、对概率和随机事件的误解、迷信思想等非理性思维,这些虚假的、错误的感觉和认识会削弱彩民的控制能力,将彩票消费推向问题博彩,损害彩民的健康、社交和经济状况。此部分主要从彩民的启发式、认知偏差、不合理的信念以及认知失调等方面展开论述,试图对问题博彩的心理学成因进行探讨分析。

2.1 控制幻觉

Walker(1992)认为问题博彩行为是由于彩民的非理性思维来维持的。他认为非理性思维主要有两个方面:控制幻觉和运气信念^[18]。控制幻觉(Illusion of Control)最先是由Langer(1975)根据“偶然事件是可以控制的”这一假设提出的,并定义为一个人对不合理的成功期望比对合理的客观概率事件的期望要高^[20]。

Toneatto(1999)^[18]指出彩民认为运气既是可控的又是不可控的。彩民倾向于认为他们已经控制运气,而且他们将会经历/遭受到周期性的好运气和坏运气。他们等待周期性的好运气,彩民会在“好运气”这一段时间里下赌注(Gaboury等,1989;Walker,1992)^[16-17]。

彩民如果在博彩的前几次就中大奖或连续中奖的话,将会“无意识”地相信是技术导致他们成功的关键。彩民会认为自己能中奖是由于自己的“技术”比别人高,“能力”比别人强,并坚信中奖概率是可控的。除了夸大他们

的技术外,问题博彩者更容易回忆其中奖的事件,而对其未中奖的事件则不容易回忆起,而且中奖的数量往往被高估,输钱的数量却被低估(Kahnemann等,1982)^[21]。彩民记得更多的赢,就相信他们在未来的赌博中还会有更好的表现,会中更大的奖,为此,彩民相信中奖(或赢)是可以预测的。

2.2 解释性偏差

Toneatto(1999)指出解释偏差也是造成问题博彩行为持续下去的原因之一。主要的解释偏差有归因偏差(attribution bias)和事后觉悟偏差(the hind sight bias)^[22]。归因偏差是指在博彩中,许多彩民将自己的成功归因与个人因素,如技术和能力(或知识),而将失败归因于外部因素,如坏运气等(Ladouneur等,1988)^[23]。这种解释性偏差促使问题彩民为他们的一再的不中奖现象进行辩解。在赢后,彩民会倾向于回想或者评估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在损失之后,彩民认为他们应该预先考虑到或预知博彩(某场比赛或某个彩票号码)的结果,因此这样就可以避免损失了。即彩民也许认为“我本来该选9这个数字的”。博彩者以他们是会赢还是输来评价他们的博彩行为,这促使彩民误认为他们在完善了他们的博彩策略后就会“大赢”。于是,彩民就继续博彩,获得一些他们自认为能让他们接近“中大奖”的经验和策略,而这又会使彩民的博彩行为持续下去。

2.3 随机偏差

彩民对概率和随机事件持有不合理的认识。彩民认为“炮弹不会两次落在同一个地方”。许多彩民认为最近刚发生过的一件事接下来再度发生的概率就会降低,尽管一件事的第一次发生同下一次发生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反过来,他们也认为最近没有发生的事件随后更有可能发生。如当某个号码刚刚作为中奖号码被开出时,人们往往主观地认为这一号码近期尤其是近一、二期被开出的概率会很小,而当某个号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未被作为中奖号码开出时,人们又主观地认为这个号码近期开出概率会很大。连续一段时间都没有中奖的彩民会认为中大奖的机会就要到了。彩民的这种典型的“赌徒谬误”反映了一种错误的观点,即机会会自我调整、自我平衡。

另外,Turner等(2006)^[6]研究发现,问题博彩者对随机事件的认识水平较低。非博彩者在有关随机事件的问题的回答上平均得分71%是正确的,然而,问题博彩者的平均得分是59.4%,这具有非常显著性的差异。个体对随机事件的概念持有老套、死板的期望,期待随机数字看起来是随机的。例如,一张号码是1-3-14-27-37-41的彩票似乎比号码是5-6-7-8-9-10的彩票更有可能中奖。尽管两张彩票具有同样的中奖几率。由此,人们对随机事件不合理的认识,导致对博彩的性质持有错误的认识。Turner等(2005,2006)研究发现,只有51%的大众正确认识到“随机数字,如12-5-23-7比序列数字如1-2-3-4的中奖机会更大”这一说法是错误的。此研究表明,一般大众对随机性的概念的认识水平相当低。Turner等(2006)研究发现,病态赌徒在这一问题上回答得更糟糕,只有38%的人认为此说法是错误的。可见,问题博彩者对随机事件持有错误的信念而且对博彩持有非理性的想法。



2.4 启发式推理——判断能力的局限性

Tversky 和 Kahneman (1990)^[24]认为,面对不确定事件时,人们的推理大多是建立在各种各样启发式法则基础之上的,而不是依靠严密的逻辑分析来作出决策判断。启发式是一种让个体对某一情景作出快速反应的有效捷径,这可能会提高决策效果,但更容易引起严重的系统性偏差。Tversky 等(1990)对个体在对不确定性事件作出判断时所依靠启发式和偏差之间的不同之处进行了探讨。他提出的主要的启发式有易得性启发式(availability heuristic)和代表性启发式(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

易得性启发式是指人们倾向于根据客观事物或现象在知觉或记忆中获得的难易程度来估计其概率的现象。易得性启发式包括通过实例或者发生的事件可以被直觉到的方式来评价某一事件的概率。实质上,人们将事件的可得性作为衡量其发生概率的一种方法。如新闻媒体对飞机失事的过度报道,而对交通事故并不经常报道。因此,人们认为飞机失事的概率高于交通工具失事的概率。事实上,飞机事故比交通事故要低得多。

回到博彩上来,中奖者的生活故事被媒体进行公开报道,而对成千上万未中奖者及中奖概率几乎只字不提。这时,彩民对中奖的“易获得性”高,这给彩民一种“暗示”,即“中大奖是有可能的”,且高估中奖的概率。另外,Turner 等(2006)^[6]研究发现,问题博彩者在他们早期的“博彩生涯”中都有过一系列的赢的经历,这可能使博彩者相信他们应用在博彩中的“技术”和“策略是正确的”。因此,易得性偏差使彩民持续博彩。

另一种启发式是代表性启发式(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代表性启发式经常用来评估概率,通过A在多大程度上代表B。代表性启发式是指人们在作决策时具有下列倾向:(1)根据样本在多大程度上与取样人群类似或代表了取样人群的特点作决策;(2)根据样本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自身生成的显著特征做决策。

这种启发式基本上是小数目的信念,总体概率的信念会在局部系列中有所反映,例如,掷10次硬币,必有一次是正面(或反面),而一直掷下去10次全是正面是不可能的。代表性启发式也许和赌徒谬误(gambler's fallacy)具有直接的关系。赌徒谬误认为在经过连续的损失后赢的概率就会增加。问题博彩者似乎有一个合乎逻辑的推理,即如果事件一贯是随机的,那么在预期的模式中一定会出现一个反面,来均衡随机分配。概率被认为是一个具有自身修正功能的过程,一次极端值的出现会引发相反方向的极端值,以保证某种平衡^[25]。这种推理的缺点,即博彩者会认为博彩并不是随机的,他仅仅是简单的不可预测而已。

赌徒谬误可能会导致“追逐(chasing)”的博彩行为。追逐行为是指博彩者一直不惜花大量的钱来赢回自己已经损失的钱。即,彩民在未中奖时会增加他们的投注量,希望之后会中大奖来赚回他们之前的损失。这种想法促使彩民持续购买彩票,尽管损失的会越来越多。根据Wagenaar(1988)^[26],代表性启发式最强烈的影响在于对机遇的信念。因为彩民对长期的手气好或坏不是报很高的期望,他们对好运气和坏运气是区别对待的,并将此作为博彩的原因。很多博彩者将运气形容为赢和输的波浪式过山车效应(wavelike roller coaster

effect)(Turner, 2000)^[19]。彩民将输归因于坏运气,而不是将其归因于不利的赔率(Wagenaar, 1988)。因此,彩民就自欺欺人地相信下一次警觉好运气和坏运气的迹象,这样博彩行为就持续下去。

代表性启发式源自一种信念,这种信念是随机的,是具有“自我修正”的功能。然而,赌徒并没有认识到他们采用的代表性启发式(和小数法则)推理决策,每一个赌博事件和其他的都是独立的,过去事件的结果和所谓的幸运将不会帮助个体正确预测未来的成功(Wagenaar, 1988)。

易得性启发式和代表性启发式都是内隐性获得,对博彩中的认知扭曲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责任。

2.5 迷信思想

迷信思想(Superstitious Thinking),是指行为人为自己的行为 and 周围发生的事情存在某种因果关系的一种思维方式(Rebber, 1985)^[27]。在博彩当中有很多种迷信行为,最终演变为问题博彩乃至病态博彩。Griffiths (1996)^[28]指出,问题博彩者很容易将他们在博彩中遇到的一些具有明显特征的事情和博彩的结果联系起来,如,某些彩民把生活中碰到的好运气或成功看成在未来博彩上的成功的吉兆。在博彩中,“中大奖”几率很少,因此,博彩者会记住“中大奖”发生的背景,即便这种联系是根本不存在的(Gaboury 等, 1989)^[16]。因此,赌徒努力重建“大赢”发生的背景,以此期望“大赢”的出现,从而避免大的损失,事实上二者没有任何的相关性。

Langer 等1975年指出,虽然问题博彩者知道博彩的结果是随机的,他们也可能同时相信博彩时需要技术。因此,博彩者根据他们自己的意愿采取各种手段试图直接影响博彩的结果。Toneatto (1999)^[18]的研究认为,这种行为是建立在博彩者的假设、臆断及错误的认知上,从而“因果”地影响博彩的结果,这些假设在社会生活中就是迷信思想。

Toneatto (1999)认为在博彩中迷信思想主要表现为护身符(talismanic)、行为和认知(behavioral and cognitive)的形式。护身符(辟邪)的迷信思想认为拥有确定的物体将会增加赢的机会。一些“幸运”事物(如兔子的脚,幸运笔)、具有重要意义的物体特种属性(如粉色)以及特殊的号码(如家人的生日,幸运数字,家庭门牌号等;Wagenaar, 1988)。这些迷信思想和博彩开始时的中奖(赢)是相关的,经常再次应用是为了对当前的游戏结果造成影响。在博彩中,人们相信这些特殊的物体、特殊的号码或幸运数字等会给自己带来一定的好运,能增加自己中奖的机会。

行为上的迷信思想表现为“特定的动作技巧或仪式可以增加获胜的概率”(Toneatto, 1999)。例如,彩民在下注之前通过烧香拜佛、占卜号码祈求保佑中大奖。另外,彩民在博彩过程中经常会有口头上的行为,如在赛马竞猜中不停地重复某一个他们想赢的数字、不断喊自己所下注的球队的名字、鼓励他们最喜欢的马、说特定的话或语句等,以此来增加自己赢的几率。

现有的研究认为,严重的问题博彩中的一个主要的认识偏差就是控制幻觉,认为迷信思想和行为是控制幻觉产生的基础,控制幻觉具有过度自信和过高的自我效能的特征,这些特征有可能鼓励彩民过度博彩。



3 结论与展望

3.1 结论

在体育博彩中,外界相关刺激、中奖以及快接近中奖的“形塑”过程等不仅会强化彩民的博彩行为,严重的会导致彩民走向问题博彩乃至病态博彩;基于社会学习理论,彩民的博彩行为是由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决定的;内隐学习是解释彩民对随机事件持有不合想法的重要机制;彩民在博彩中的非理性思维是问题博彩行为形成的基础,它会削弱彩民的控制能力,将彩票消费推向问题博彩,其中因果关系的错误信念催生了控制幻觉的产生,对持续的问题博彩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

3.2 展望

3.2.1 完善问题博彩行为的理论基础

博彩心理学研究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心理学的范畴,而且是边缘性和综合性很强的一门学科。所以,应同时从生理学、医学、精神病学、社会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等角度对此加以系统地研究,夯实问题博彩行为的理论基础。

3.2.2 对于问题博彩行为的心理机制做更加广泛的研究

关于问题博彩行为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行为,它形成的原因亦非常复杂。因此,未来的研究应对问题博彩行为的成因做进一步的研究,不仅仅探究其心理机制还要探源其生理机制以及从精神学层面进行全面分析研究,为预防和治疗问题博彩行为提供合理的理论基础。

3.2.3 探究问题博彩行为的影响因素

影响问题博彩行为的发展和保持的因素很多,不止文章中提到的这些非理性的思维,还有其他各方面的因素也会对博彩行为产生影响,并且每个影响因素之间具有交互作用。因此,要对问题博彩行为进行更深入的理解和研究,还需考虑生物学和遗传学、心理学、社会学和环境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以期对问题博彩有更合理的认识与解释。

3.2.4 利用心理学的理论来预防和治疗问题博彩行为

心理学的理论对解释问题博彩行为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且对预防和治疗病态博彩者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未来的研究应注重利用心理学方面的理论来预防和治疗问题彩民的博彩行为。

参考文献:

- [1] 李海. 体育博彩概论[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 [2] 白彩梅, 王树明, 马文飞等. 体育彩票消费中问题博彩的认知偏差研究[J]. 体育科学, 2009, 10(29): 17-22.
- [3] Anderson, G., & Brown, R. I. F. (1984). Real and laboratory gambling, sensation seeking and arousal[J].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75, 401-410.
- [4] Jacobs, D.F. (1986). A general theory of addictions: A new theoretical model[J]. *Journal of Gambling Behavior*, 2, 15-31.
- [5] Marlatt, G.A., & Gordon, J.R. (Ed.). (1985). *Relapse Prevention: Maintenance strategies in the treatment of addictive behaviors* [M].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6] Turner, N.E., Zangeneh, M., & Littman-Sharp, N. (2006). The Experience of Gambling and its Role in Problem Gambling[J]. *International Gambling Studies*, 2006(2), 237-266.
- [7] Skinner, B.F. (1953). *Science and human behaviour* [M]. New York:

Free Press.

- [8] REID R L. The psychology of the near miss[J]. *Journal of Gambling Behaviour*, 1986, 2(1): 32-39.
- [9] ARIYABUDDHIPHONGS V, CHANCHALERMPORN N. (2007). A Test of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Reciprocal and Sequential Effects: Hope, Superstitious Belief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among Lottery Gamblers in Thailand [J]. *Journal of Gambling Studies*, 23: 201-214.
- [10] Coups, E., Haddock, G., & Webley, P. (1998). Correlates and Predictors of Lottery Play in the United Kingdom [J]. *Journal of Gambling Studies*, 14, 285-303.
- [11] Griffiths, M. (2000). Scratchard gambling among adolescent males [J]. *Journal of Gambling Studies*, 16, 79-91.
- [12] Blascovich, J., Ginsburg, G.P., & Veach, T.L. (1975). A pluralistic explanation of choice shifts on the risk dimension[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1, 422-429.
- [13] Holtgraves, T. M. (1988). Gambling as self-presentation[J]. *Journal of Gambling Behavior*, 4(2), 78-91.
- [14] Metzger, M. A. (1985). Biases in betting: An application of laboratory findings[J]. *Psychological Reports*, 56, 883-888.
- [15] 郭秀艳. 内隐学习研究综述[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04, 22(11), 49-55.
- [16] Gaboury, A., & Ladouceur, R. (1989). Erroneous perceptions and gambling[J]. *Journal of Social Behaviour and Personality*, 4, 411-420.
- [17] Walker, M.B. (1992). *The psychology of gambling* [M]. Oxford: Pergamon Press.
- [18] Toneatto, T. (1999). Cognitive psychopathology of problem gambling [J]. *Substance Use and Misuse*, 34(11), 1593-1604.
- [19] Turner, N. (2000). Randomness: Does it matter?[J]. *The Electronic Journal of Gambling Issues*, Issue 2.
- [20] MARK D. GRIFFITHS. The Cognitive Psychology of Gambling [J]. *Journal of Gambling Studies*, 1990, 6(1): 31-41.
- [21] Kahnemann, D. & Tversky, A. (1982). The psychology of preferences[J]. *Scientific American*, 136-142.
- [22] Ladouceur, R., & Walker, M. (1998). Cognitive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and treating pathological gambling. In A.S. Bellack & M. Hersen (Eds.), *Comprehensive clinical psychology*. New York: Pergamon. Ladouceur,
- [23] R., & Gaboury, A. (1988). Effects of limited and unlimited stakes on gambling behavior[J]. *Journal of Gambling Behavior*, 4(2), 119-126.
- [24] Tversky, A., & Kahneman, D. (1990). 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 In P.K. Moser (Ed.), *Rationality in action: Contemporary approach*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5] 庄锦英. 决策心理学[M].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6: 102.
- [26] Wagenaar, W.A. (1988). *Paradoxes of gambling behaviour* [M].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27] REBBER A.S. (1985). *The Penguin Dictionary of Psychology* [M]. London: Penguin.
- [28] Griffiths, M. (1996). *Adolescent gambling* [M]. London: Routledge.
- King, K. M. (1990). *Neutralizing marginally deviant behaviour:*

(责任编辑: 陈建萍)